

中國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研究的新視野 ——評聖凱教授英文版《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

王潔
清華大學

佛學研究在歐美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然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方面，於漢傳佛教則所涉甚少。直到二十世紀 80 年代，隨著美國佛教研究的多元展開和方法反省，漢傳佛教才逐漸被給予足夠的重視。而且，對漢傳佛教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個或幾個側面，很少有全局性的討論。通史類的佛教史著作屈指可數：十九世紀早期傳教士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對中國佛教情況的簡要梳理；1956 年芮沃壽 (Arthur F. Wright, 1913–1976) 《中國佛教史》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一個簡明扼要的小冊子；1959 年許理和 (Erik Zürcher, 1928–2008) 《佛教征服中國》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影響很大，但只是一部斷代史，主要考察五世紀之前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1964 年陳觀勝 (Kenneth Ch'en, 1907–1986) 《中國佛教史概論》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作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至今依然是

歐美漢傳佛教研究所參考的主要通史。¹但時移世易，過去的五十多年中，隨著學術的進步，各種新材料和新觀點出現，這部書在許多方面都略顯過時，比如其將宋朝之後的中國佛教視為“蕭條與衰落”，就忽視了宋朝佛教社會化的成功，也未能反映明代晚期佛教中興的現實，更不能充分呈現晚清民國之後中國佛教的復興。因此，歐美學界迫切需要一部新作，在綜合過去五十多年中、日、歐、美學術界研究成果基礎上，對中國佛教信仰史做一次新的梳理。聖凱《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英文版（*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 by Kai Sheng. [Trans. Jeffrey Kotyk, Matt Osborn, Gina Yang; ed. Jinhua Chen]. Leiden; Boston: Brill, 2020）的出版彌補了歐美佛教研究領域的這一缺失，為海外中國佛教研究提供了一部新的佛教通史。

《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英文版在結合過去幾十年現代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整體佛教”的研究視野，從制度史、社會史、文化史的視角具體展開，重點關注普通佛教徒的信仰與生活，對龐大複雜的中國佛教信仰史進行提煉，總結出“空間性創造”、“禮儀化表達”、“理性主義與集體主義”、“實用主義”等特點，寫就一部新時代的佛教史。

一、“整體佛教”的研究視野

《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作為一部中國佛教史，也是一部佛教“中國化”的歷史。近百年的中國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思想領域

¹ 參考李四龍《歐美佛教學術史：西方的佛教形象與學術源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27-231。

去探討“中國化”，很少從“整體”佛教的角度考察這一問題，而“佛教中國化”的研究也缺乏將“中國”作為一種整體背景去思考。聖凱教授此作則試圖從一種“總體史”的視角來切入這一問題。

法國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倡導一種“總體史”觀，認為歷史研究應當是科學的、比較的、綜合的、全面的，強調歷史包括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各領域之間互相聯繫、彼此作用，其結構與功能形成一個整體。他們同時強調長時段研究(longue durée)，認為長時段的現象才能表現歷史的深層結構，形成整個歷史發展的基礎，對歷史進程起決定性和根本的作用。《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的思路與此不謀而合，該書注重對長時段歷史中佛教信仰與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考察，對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互動以及這一互動中雙方各自的演化過程進行展示。

“信仰”、“生活”，以及這兩個詞的複合形式“信仰生活”為該書的關鍵詞，這三個抽象的概念大約可勾勒出全書主旨。大多數人，不管是學者、信仰者還是佛教的旁觀者，往往都只能接觸到佛教的某一個或者幾個側面，可能是理論，可能是儀式，也可能只是建築雕塑等某種以藝術品身份出現在社會中的事物。該作結合中國本有文化的信仰特點，考察佛教信仰的本身思想、歷史演變、現狀，關注佛教信仰的典籍、信仰心理、信仰活動、信仰禮儀、信仰史。在文獻方面，注重文本、考古文物、敦煌遺書等綜合，同時也注意結合文獻背後的歷史情境進行分析。作者試圖提供一個關於中國佛教的全面圖景，不局限於某一人、一書、一地或者一個時間點，而是去展現中國佛教的方方面面。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不僅為中國人帶來全新的精神世界，更將全新的生活方式移植入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佛教以佛、法、僧為三

大要素，它們分別體現了信仰、思想和制度。佛教信仰集中在“佛”和“僧”方面，但是以“法”為思想基礎，如慈悲、感應、佛身、二諦等思想。在“佛”層面的信仰內容有淨土信仰（彌陀、彌勒、藥師）、名山信仰、救濟信仰（民眾的信仰心理）、舍利信仰、菩薩信仰（觀音、地藏、文殊、普賢、彌勒）等，在“僧”層面的信仰內容有節日、法會、念誦、懺法、素食等。

該書以縱向的歷史演變與橫向的事項分類為雙重坐標，展開對信仰與生活圖景的全面考察。縱向維度自魏晉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橫向維度則以信仰與生活為著眼點，重點剖析了懺法、法會、素食、慈善、講經、放生、菩薩信仰、名山信仰、舍利信仰等，考察了這些信仰活動的形成過程，探討中國佛教徒的信仰表達方式及其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揭示了佛教信仰與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融合過程。

二、從精英到僧眾的主體轉向

傳統的中國佛教研究經常呈現出一種精英視野——以高僧或者有影響力之居士的行為和思想為關注點，然而，在學術史發展到本世紀之後，逐漸具有了一種“主體轉向”的傾向：不再以精英人士為關注點，而是強調“群像研究”，以普通大眾為關注對象。將關注點聚焦於普羅大眾的生活與觀念成為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一種新趨勢，因為它揭示的歷史事實遠比對精英的有限研究要豐富得多：精英思想和經典文本未必在普通大眾的生活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當人們做決定，做解釋、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法時，他們大多數時候所求助的思想資源是社會上流行的一般性知識、思想和信念，而非精英思想

和經典文本。此外，偉大人物、創造性的思想觀點是間歇性出現的，而且很多時候依靠個人天賦，難以追溯其思想淵源。與之不同的是，大眾生活所依賴的知識和思想有充分的連續性，這些觀念發展速度十分緩慢，在歷史中能比較清晰地觀察到其演變的脈絡。

聖凱教授將“僧眾”視作一種具有共同意義追求和制度規範的“宗教共同體”，《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的研究對象就是這一共同體的平均觀念和日常實踐，旨在呈現一般佛教徒生活、知識、思想和信仰的歷史。以本書第一章魏晉南北朝佛教徒的信仰與生活為例，通過考察懺法形成，素食傳統建立，社邑和慈善事業初啓，《法華經》、藥師佛、觀音、舍利子等新型信仰對象之流行等現象，聖凱教授試圖呈現“僧伽”這種全新的組織結構和生活方式是如何“嵌入”中土原有的權力結構、社會階層和生活形態之中。他認為，佛教的傳入，不僅帶來觀念的衝突，還帶來制度與生活的衝突，而後者更加現實、鮮活且影響更為深廣。中國漢傳佛教信仰與生活的形成是這種衝突之下佛教自我調適、自我創新的結果。

該作並非聖凱教授的第一部此類作品，在此之前，他還著有《中國漢傳佛教禮儀》(2001)、《善導大師的懺悔思想與禮贊儀》(2001)、《中國佛教懺法研究》(2004)等，都體現了這種對佛教徒群體生活樣態的考察。然而，本書與上述幾部出版於近20年前的著作有所不同，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更宏大的視域：在大量呈現僧眾信仰與生活的細節前提下，作者也進行了充分的審思，以一種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不同時代的佛教徒信仰生活特點，試圖去解釋這些僧眾生活細節中所呈現的中國佛教史進程和中國佛教信仰的總體特質。

三、中國佛教信仰的特質

《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的英文版主體內容與中文版一致，差別則體現在兩方面：給每一章添加了小結；全書增加了結論章。各章小結和全書結論章的功能相似，都在制度史、社會史、文化史的視野下，考察與總結中國佛教信仰的特質，即佛教信仰在中國所重視或創新的對象、表達背景、表達方式，總結出各時期信仰的核心特點，並綜合提出中國佛教信仰的總體特質。聖凱教授提煉出的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特質包括以下幾方面：空間性創造、禮儀化表達、理性主義和集體主義、實用主義。

空間性創造指的是中國佛教信仰對象的新特點。傳統而言，佛法僧是佛教信仰的對象。中國佛教繼承印度這一傳統的同時，還創造了一些新的信仰對象，比如四大名山信仰、舍利信仰、祖師信仰。其中“四大名山”的創造是一種聖地的搬遷，是“佛土”向中國的空間移動，意味著佛教信仰中心的“空間遷移”。中國佛教克服邊地情節，主動將“自己”歷史性地界定為未來“佛土”，真正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

禮儀化表達指的是中國佛教信仰表達方式的新特點。中國佛教信仰表達受到王權政治和宗法禮制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直接影響體現在王權政治對於中國佛教的直接干預，比如，舍利信仰、素食傳統形成等都顯示出“國家佛教”的意志。間接影響體現在中國文化對佛教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祖師信仰就有中國祖先崇拜觀念的痕跡，清規制度的建立也展現了中國“禮”文化的感召力。

理性主義指的是隋唐宗派所建構出來的精英佛教特點，不僅強調指向解脫的宗教性，還側重理論闡明的智慧性。集體主義指的是

佛教的傳入為中國社會提供了一個共同的信仰對象，改變了中土多元化信仰的歷史。這種共同信仰又進一步推動了“社”、“法社”、“邑”等信仰團體的形成，體現出了中國佛教信仰表達中的“群體性”特徵。

實用主義則指的是中國佛教信仰旨趣的變化。印度佛教以離苦得樂的解脫為最高追求，但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經過觀念、思想、制度上的衝突、融合，把關注點轉移為“當下”，更多地展現為對現世安穩、諸難遠離與懺悔滅罪的追求。

總之，聖凱教授此書對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的面貌與特點進行了細緻而周全的刻畫，為海內外學術界理解中國佛教的全貌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英譯版的出版有助於深化佛教界中外學術交流與對話，加強中國佛教研究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此外，該作的出版還有另一重涵義，《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英文版是搭載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東風而出版的，其翻譯與出版還同時受到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基金會（SSHRC）“基於多元媒質資料和跨學科視野下的東亞宗教綜合研究”（“拔地入雲”）項目的支持。出版後，該作被 BRILL 列為開放獲取圖書（open access），收入歐洲知識解碼計劃（Knowledge Unlatched）2020 圖書。根據 CC-BY-NC 許可證，通過歐洲知識解碼計劃的著作在 JSTOR、Researchgate、Academia 等學術網站可以自由共享。因此，此書出版不僅為中國佛學研究走出去的進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還體現了當今全球學術共同體互相合作、共同打造當代學術版圖的努力。